

GAO KAI JUN LISHI WENBO LUNJI

# 高凱军历史文博论集

高凱军◎著



# 高凱军历史文博论集

高凱军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凯军历史文博论集/高凯军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4

ISBN 978 - 7 - 101 - 07083 - 5

I . 高… II . 高… III . ①中国 - 历史 - 文集②文物 -  
考古 - 文集③博物馆学 - 文集 IV . K207 - 53 K85 - 53  
C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601 号

---

书 名 高凯军历史文博论集  
著 者 高凯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4 字数 28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083 - 5  
定 价 56.00 元

---

# 自序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我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三十年。是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给我提供了接受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把我从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培养成了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激励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热情和信念。因此，我深怀感恩之情，一直心存要用所获学识为深化改革和繁荣学术做点事情的强烈愿望。

我于1982年1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分配到大庆师范专科学校（现大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了五年书。1991年7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宁可教授门下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分配到国家人事部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国家机构与编制研究室，为行政和人事制度改革搞了九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2000年3月，应聘来到北京市文博行当至今，算是回归了我的本行。此间，我在历史、文物、博物馆和行政管理学领域，除了出版几本专著之外，累计发表论文、译文五十余篇。近来翻检旧稿，虽然有用的不多，但当时我都是充满敬业精神地去做的。

这次从未发表和已发表的有关中国历史、文物和博物馆方面的

论文中选出十五篇，结为一集。排在前面的未发表的两篇，是去年的旧稿，今年修订完成的；已发表的十三篇，多少都做了些修改，修正了已发现的印刷校对和写作方面的错误，同时增补了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这些文章提出并论述了我在学术探讨中的一些粗浅见解，觉得还算拿得出手，或许对读者还有一些参考价值。同时，也想以此来纪念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三十年，因此，将应邀撰写的《我的大学梦》一文作为附录收了进来。上述学术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和材料可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欢迎读者尤其是同行读者批评、讨论。

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北京市文物局领导、学术委员会和首都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2008年9月25日  
写于鄂尔多斯旅途

# 目 录

自 序 .....	(1)
影响华夏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 .....	(1)
从秦、汉的统一和政策、措施看华夏向汉族的发展 .....	(46)
从隋文帝的民族政策看隋初的经济繁荣 .....	(78)
地理环境在匈奴族形成中的作用 .....	(89)
室韦源于鲜卑说新论 .....	(105)
关于通古斯族系兴起的若干问题 .....	(122)
六至八世纪汉族对突厥族的影响 .....	(149)
突厥汗国在突厥族形成、分化和衰落过程中的作用 .....	(173)
北京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	(200)
关于永乐大钟若干问题的探讨 .....	(222)
永乐大钟历史成因分析 .....	(236)
关于乾隆御笔《帝都篇》、《皇都篇》碑刻的主题 .....	(254)
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文注释 .....	(258)
博物馆与终身学习理念	
——关于《韩国城市博物馆的新角色——发展终身教育》	
的讨论 .....	(264)

关于博物馆科研工作的三个重要环节 ..... (269)

附录：我的大学梦 ..... (280)

# 影响华夏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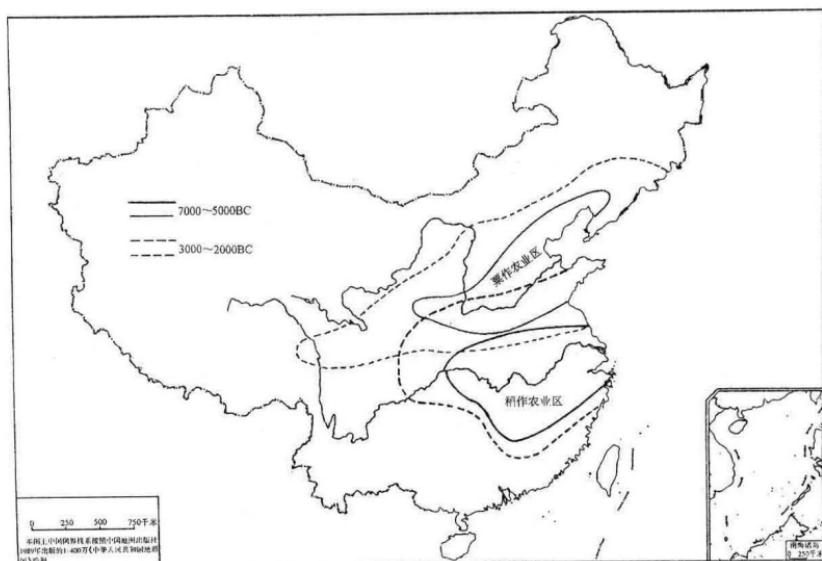
先秦文献中称汉族的前身为夏、诸夏、华夏。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些名称所指的人类共同体已具备了古代民族的基本特征。例如，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的创造，标志着华夏共同语言、文字的基础已经确立；《禹贡》九州观念的出现，反映了华夏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也有了大致的轮廓；三皇五帝古史传说和华夏族称的形成，说明华夏的共同祖源和民族认同意识业已产生。

但是，具有上述特征的华夏族是怎样起源、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个过程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迄今尚缺乏深入探讨。本文试就地理环境、农耕经济传统以及“三代”政权的建立、传承和文化趋同等元素对华夏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谈谈作者的初步看法，也许有助于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供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参考，不妥之处欢迎读者特别是有关专家批评和讨论。

## 一、地理环境的特点与华夏族的农耕经济和物质文化特征

任何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进行的。华夏族作为一个农耕民族，首先是受惠于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有利于农业经济起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

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成了中国农业文明起源的温床。长江流域形成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区；黄河流域形成了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区。<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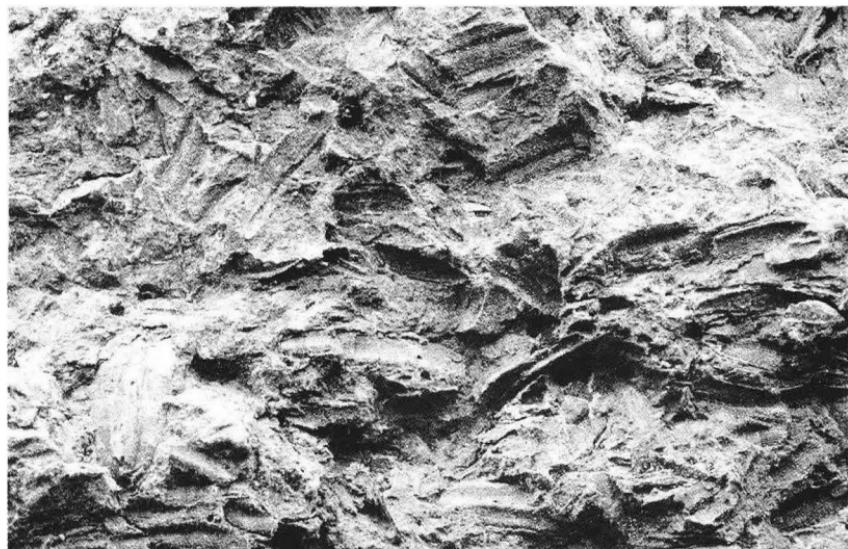


史前两种农业体系分布图<sup>②</sup>

从稻、粟起源的角度看，两大农业区形成的时期大体相当，长江流域应该更早一些。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年

① 参见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155页。

② 同上，第154页。



浙江金华上山遗址出土夹炭陶片中的谷壳(金华博物馆提供)

的栽培稻遗存,该稻粒长度比野生稻短,宽度比野生稻宽<sup>③</sup>;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和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现了许多距今 6000—7000 年前人工栽培的炭化稻谷<sup>④</sup>;在杭州附近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人工栽培稻谷遗物,中外专家据此推断该地区人类最早尝试耕种水稻应在一万年前,并确认中国种植水稻始于 7700 年前。<sup>⑤</sup> 黄河流域发现粟、黍的时间,据前引严文明文,最早的是在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粟,以及在河南裴里冈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粟和黍,距今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但是,后来由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全球性气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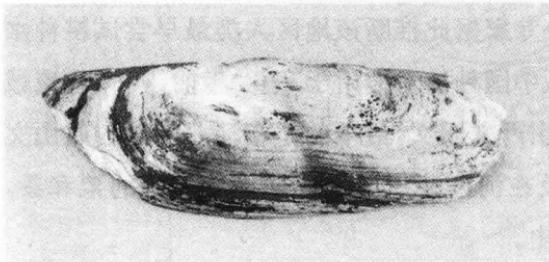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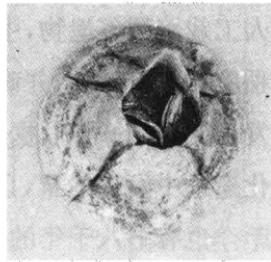
<sup>③</sup> 《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距今万年的栽培稻遗存》,《光明日报》,2005 年 1 月 21 日,第 1、2 版。

<sup>④</sup> 参见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 38—42 页;首都博物馆《长江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年,第 23 页。

<sup>⑤</sup> 托马斯·莫《新近考古证实中国在 7700 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参考消息》,2007 年 9 月 29 日,第 7 版,此文原载美国《洛杉矶时报》,2007 年 9 月 27 日。又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 年,彩版四六,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谷和稻米、图版四二,下孙遗址出土的稻米。

升高和海平面上升的过程<sup>⑥</sup>,使南北两大农业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上述南方稻作农业在七、八千年前起源的情况看,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距今一万年的最初三千年中,即全球性气温升高的初起阶段,对于地处北半球的东亚大陆来说,受益的首先是纬度较低的南方地区,所以那里的古人类发明了稻作农业。此后气温进一步升高,到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左右的帝尧时代,达到了顶点。据《淮南子·本经训》,在帝尧之时,曾出现过“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的高温现象。气温升高,必然加剧冰川融化、江河泛滥,低洼的地方受到洪水的冲击在所难免。《尚书·尧典》说:“帝尧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夏本纪》也因袭了这种说法:“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扰。”这些记载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佐证。

环境学家根据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推测:我国东部地区距今4000年前,曾发生过空前的大洪水。黄河、长江下游流域地势较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当时,太湖流域的水位升

缢蛏骨壳<sup>⑦</sup>薄壳星藤壶<sup>⑧</sup>

<sup>⑥</sup> 1990年,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海洋考古证明,在一万八千年前的玉木冰期时代,渤海曾是茫茫沙漠,呈植被稀疏的荒漠景观,直到一万年前被海水淹没。参见《人民日报》,1990年8月19日,第8版。

<sup>⑦</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版四一,图3。

<sup>⑧</sup> 同上,图版四一,图4。

高，并淹没了低地，在良渚文化层上形成了一层 0.5 米左右的灰黑色淤泥，这给先民们带来了几乎是灭顶之灾<sup>⑨</sup>。与此同时，由于冰川融化、江河泛滥，导致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海浸现象。在上述浙江跨湖桥遗址东北约两公里处的下孙遗址曾发现了鲤、黄、鮀鱼、锯缘青蟹及数量较多的鱼类脊骨、鳍棘、肋骨和鳃盖骨，还有近江牡蛎、长牡蛎、薄壳星藤壶、船蛆、缢蛏骨壳等。这些说明当时杭州一带确曾遭到过海浸。应该说，正是这些构成了中国鲧、禹治水传说和西方诺亚方舟传说的真实历史自然背景。



船蛆<sup>⑩</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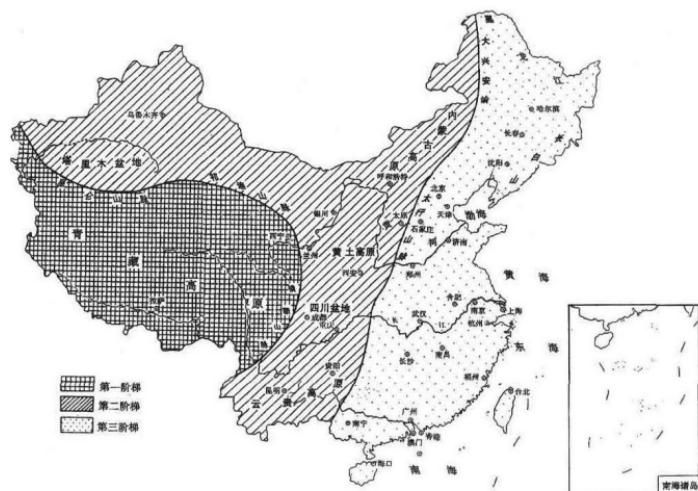
由于南方地区长期酷热、潮湿、水患频繁，使长江下游流域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所创造的稻作农业文明趋于衰落，而北方黄河、洛水流域的旱作农业文明，由于地势较高、受洪水影响较小而逐渐恢复和繁荣起来，并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sup>⑪</sup>

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旱作农业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其自然因素主要有二：第一，在洪水泛滥的大背景下，由于地势的原因，这里更适合古人类的居住。这里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大体处于中国地势

<sup>⑨</sup> 王宝福、李民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年。

<sup>⑩</sup> 前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图版四一，图 5。

<sup>⑪</sup> 张弛《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起源——以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为核心》，载北京大学考古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2 年。

中国地势图<sup>⑫</sup>

一、二阶梯的交界地带，广泛分布着土层深厚的原生黄土和次生黄土。<sup>⑬</sup>这两种黄土具有特殊的柱状或垂直状节理，易于挖穴居住，冬暖夏凉，有利于先民抵御四五千年前炎热潮湿的气候。历史地理学和物候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较现在温暖、潮湿的气候广泛分布于从今东北北部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波及到蒙古高原和青藏

<sup>⑫</sup> 周立三主编《中国农业地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图2-1。

<sup>⑬</sup> 古地理学界一般认为，由风力搬运堆积、未经次生扰动、无层理的黄色粉质含有丰富的碳酸盐并具有大孔隙度的土状沉积物是原生黄土，黄土高原是原生黄土的主要分布区；凡由非风力搬运堆积的即主要由冲积、洪积和坡积而形成的有层理和沙砾的粉土状沉积物为次生黄土，华北平原是次生黄土的主要分布区。黄土的厚度以黄土高原为最，特别是洛、泾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经常厚达百米，局部地区可达180米，由此向东、西两个方向，厚度逐渐变薄，在华北平原的边缘如太行山东麓以及燕山南麓、山东丘陵北侧，厚度概为10—40米，超过50米的地方很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多为10—20米，只有少数地方可达50米。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7—189页；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第136—141页。另据辛树帜先生对《尚书禹贡》所述雍、冀、豫三州的土壤情况所做的分析：雍州为今陕西，多为淡栗钙土，系发育于原生黄土，或即所称黄壤；冀为今河北、山西，平原每为盐渍土壤，微呈白色，或即所称白壤；豫为今河南，平原多为石灰性冲击土，或即所称壤。无论盐渍土或灰性冲击土，皆属黄河冲击之次生黄土。参见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128页。

高原。<sup>⑯</sup>《墨子·辞过篇》在谈到远古先民选择居住地点时曾说过：“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在当时普遍温暖、潮湿和洪水泛滥的气候条件下，黄河中下游流域土层较厚、水位较低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自然就成了当时人们的最佳选择。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如仰韶文化、裴里冈文化、磁山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齐家文化等都集中分布在这里。

第二，这里的土壤肥沃，水系丰富，降雨充沛，有利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五六千年前，这里大体属于半干旱草原区，空旷少树<sup>⑰</sup>，无需清除树林，用当时的石器、蚌器、骨器和木制的耒耜等比较简陋的工具就能容易地开掘。所开掘的土壤也比较疏松，以0.05—0.01毫米的颗粒最占优势，并有很大的空隙度，有的高达40—70%<sup>⑱</sup>，加上当时气温较高，降雨充沛，有利于种子的发芽生长。据孢粉分析，距今7500—5000年前，我国的平均气温比目前高2—3℃，降雨量也比目前多500—600毫米。<sup>⑲</sup>同时，这里水系丰富，除了黄河水系之外，还有海河、淮河和关中盆地水系<sup>⑳</sup>，便于农田灌溉。

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上述优越自然条件的吸引下，使来源和经济生活方式各异的夏、商、周三大部落集团相继汇集到了这一地区。

<sup>⑯</sup> 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10、16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95页，图3；郑斯中等《我国东南部地区近两千年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会议文集》，1977年。

<sup>⑰</sup> 前引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144—445；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sup>⑱</sup> 前引《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第186页。

<sup>⑲</sup> 李世奎等《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和农业气候区划》，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22—227页；王开发等《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一万余年气候变迁》，《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sup>⑳</sup> 关中平原主要有泾、渭、漆、沮诸水。《尚书·禹贡》记载：“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厥土为黄壤，厥田为上上。”

结合前面浙江河姆渡、上山等遗址稻作农业的发展情况,可以推知,夏后氏是来自于南方江浙一带的原始农耕部落集团。《左传》哀公七年(前488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就是在这次部落云集的联盟大会上,以自己治水和伐三苗的功绩,得到了涂山氏部落的支持,继舜之后当选为部落联盟酋长的。涂山的地理位置,目前说法有三:其一,据《越绝书·纪地传》:“涂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县(即浙江绍兴——引者)三十里。”《国语·鲁语》和《说文解字》也认为涂山即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山。前者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后者卷九“涂山”条说:“涂山,会稽山也。”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嵊县、诸暨、东阳之间,是钱塘江支流浦江与曹娥江的分水岭,亦称茅山、防山。后因禹曾在此大会诸侯,计功封爵,始名会稽山。其二,据《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文字音义》,认为涂山即今安徽蚌埠以西、淮河东岸的当涂山,与荆山隔江相对,相传此二山原为一山,禹凿而为二,以通淮水。其三,据《华阳国志·巴志》:“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这个涂山地处今重庆以东,俗名真武山。

史树青先生以历史文献与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为依据,考证禹的前任舜的出土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sup>⑯</sup>,应系符合实际的见解。如前所述,由于当时南方长江下游洪水泛滥,人们在七千年前所创造的稻作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冲击。为躲避洪水,舜、禹除了率所部沿着中国阶梯地势自江浙北上,别无选择。他们的北徙过程是十分艰难曲折的,途中留下一些遗迹或记忆和传说是很自然的事。例如,与舜有关的历山、舜井的传说有三处,一在浙江余姚,二在山东雷泽,三在山西妫州,所反映的是舜及其部落自南而北迁徙的过程。<sup>⑰</sup>因此,上述三处涂山传说也可以理解为禹率部众北迁过程中

<sup>⑯</sup> 史树青《鉴古一得》,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89—191页。

<sup>⑰</sup> 参见拙著《通吉斯族系的兴起》,中华书局,2006年,第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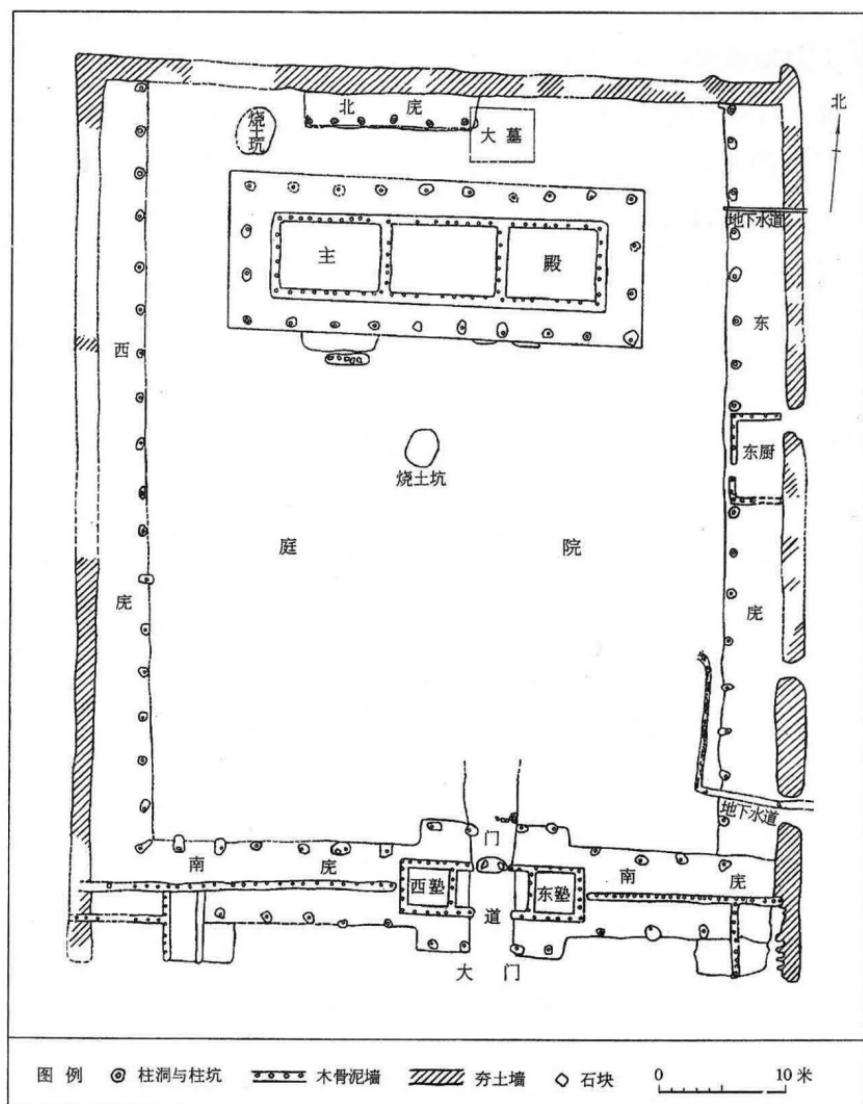
所留下的记忆。他们从会稽山出发<sup>②</sup>,途经安徽蚌埠的当涂山,再西进到达重庆东部的真武山,然后从这里北上,经甘肃、陕西进入河南二里头一带<sup>②</sup>,并在这里完成了从氏族公社的选举制向阶级社会的王权世袭制的过渡<sup>②</sup>,依据他们在南方积累下的定居农耕经验,修建了城郭沟池,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sup>②</sup>

<sup>②</sup> 从大禹的后裔及其对大禹的祭祀地点以及“九歌”音乐形式流行于长江中下游的两湖地区,也可以确认夏后氏来自于长江下游地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氏少康之庶子。”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得更加具体:“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山海经·大荒西经》记录了启从上天获得九辩、九歌的神话。从楚辞来看,“九歌”的诗歌和音乐形式最初流行于南方,屈原的《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也说:“启梦宾帝,九辩九歌。”郭沫若认为楚辞九歌是从夏九歌演变而来的。从中可间接证明,禹、启最初是来自南方,否则九歌的诗歌和音乐形式怎么可能首先在南方流行呢?对于禹、启来自于南方,秦始皇也确信无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秦始皇南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如此看来,西汉杨雄《蜀记》、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据《史记·六国年表》关于“禹兴西羌”的记载附会出来的“禹生石纽”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冯汉骥《禹生石纽辩》,载《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sup>②</sup> 这可能就是《史记·六国年表》中关于“禹兴西羌”说法的历史背景。

<sup>②</sup> 《墨子·万章上》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禅”就是原始氏族社会酋长选举制,“继”就是“三代”奴隶制王国国王的世袭制。据《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和《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禹的晚年虽然表面上按照选举制的原则推举了益,而私下里又令自己的儿子启杀益并取而代之。这实质是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国家取代氏族公社的反映,从此,开启了“三代”奴隶制王国的国王世袭制的先河。

<sup>②</sup> 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在河南偃师霍镇乡二里头村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早期的遗存,其年代据碳14年代数值和考古学编年序列推定为公元前19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约三百余年。在这里发掘出了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宫殿、庙堂建筑基址群,还有鼎、盉、斝、爵等青铜礼器和戈、刀、镞等青铜兵器以及象征王权的璋、圭、戚、钺等玉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1—69页。关于夏初的国家机构情况,在《尚书·甘誓》中有所反映。《甘誓》是夏初启与有扈氏战于甘的战前誓词,其中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从中可知,夏初的国家机构已初具规模,其中有“王”、“六卿”、“御”、“正”等各级官僚,还有军队和刑法。



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基址平面图<sup>②5</sup>

<sup>②5</sup>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 66 页。